

## 第十一章

---

### 萨朗访渝

---

#### 萨朗何许人也

法国殖民者急欲重返越北，恢复殖民统治。1945年11月1日，经法国驻远东军总司令勒克莱上将推荐，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海军中将任命拉乌尔·萨朗（Raoul Salan）为法国驻越北军队司令。此即圣德尼向何应钦讨好时说的“中国方面不喜欢法军司令亚历山德利，已派人接替”的法方司令。同年12月12日，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奉卢汉之命，往访萨朗；马瑛特约我同往，我们会见萨朗并邀请他夫妇出席14日卢汉的午宴。我也参加了这次午宴。从此以后，我同他经常接触。他是我在河内所接触的法国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。

拉乌尔·萨朗生于1899年，1917年8月在第一次大战时服兵役，旋考入圣西尔军校；1918年第一次大战时参加凡尔登保卫战，1919年升任少尉；1920—1921年参加近东战役，受重伤；1924年往印度支那，任中尉、上尉，驻中国边界和湄公河上游的老挝；以后回法国任少校，到殖民部任情报处处

长；1940年1月任法国塞内加尔散兵营作战指挥；1940年8月任殖民地部参谋二厅厅长；1942年在达喀尔任法属西非二厅厅长；1943年在阿尔及尔任殖民地部参谋二厅厅长；1944年升上校，任塞内加尔步兵团团长，1月在厄尔巴岛、布洛旺斯登陆，解放了都隆港，并在杜布河和阿尔萨斯进行了艰苦的战斗；1944年12月晋升少将，指挥以老游击战士为骨干的第十四师；1945年11月由勒克莱上将推荐，任驻越北部队司令；1946年7月因海防中法军队冲突事件被调回；1947年5月复任印度支那北部法军司令；1950年末任印度支那法军总司令；1953年返法，任国防部全国地面部队总视察，曾巡视印度支那；1954—1956年任法国战略后备总指挥，属国防最高委员会；1956年末，在阿尔及尔升任上将；1958年5月任法国政府驻阿尔及尔总代表和阿尔及利亚驻军总司令；1958年末返法，以国防总监名义，执行巴黎总督任务，1960年6月退休；1961年4月发动阿尔及尔军事政变，反对戴高乐与阿尔及利亚和谈，政变失败潜逃，被剥夺军职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处死刑；但1962年4月20日在阿尔及尔被捕，再受审判，被判无期徒刑；1968年6月15日获特赦，从法国图尔(Tulle)监狱释放。

从他的简历中可以看出，他是在越南发迹起家的法帝国主义军人，是戴高乐派中最顽固的极右人物。以拥护戴高乐始，以反叛戴高乐终。他外表潇洒，而内心非常狡诈，善于刺探情报，是个典型的法国殖民主义军官，也是法越战争的主要败将之一。<sup>①</sup> 萨朗著有回忆录四卷（1971年在巴黎出版，书名《一个帝国的末日》专谈印度支那和越南），对于国民党军队在越北受降，特别是他在重庆的活动在前二卷有较为冗长而详细的回忆。

## 萨朗在渝活动

萨朗任驻越北部队司令之时，法国新派来的部队尚未登陆，原来的法国殖民军大部分被关在日本军营中还未释放，小部逃往我国云南的败军也未被放回，他不过是一位光杆司令。所以他一到河内就积极活动，四处奔走，要求一方面军司令部允许在云南避难的法军重返越南，释放并重新武装拘禁在军营的法军，以便恢复法国对越北的统治。他在河内四处碰壁之后，又欲利用国民党内部军、政之间以及地方、中央之间的分歧，赴重庆活动。终于获得重庆政府批准，允其赴渝商洽交接防务问题。他于1946年1月5日从河内飞昆明，7日转乘中航班机飞抵重庆。他一到重庆就使出了刺探军事情报的浑身解数，大肆活动。

萨朗到达重庆时，由法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陆军少校吉业马（Guillermaz）到机场迎接。这时，贝志高大使已经离任（1945年12月贝志高向蒋介石辞行时，蒋又再次保证，国民党军队不久即从越北撤走）。新任大使梅理霭尚未呈递国书。梅理霭利用他递交国书的机会，把萨朗介绍给蒋介石。据萨朗回忆，1月7日，梅理霭向蒋介石递交国书，他同大使馆参赞、秘书和武官一起参加递交国书典礼。梅理霭首先把他介绍给蒋介石，蒋介石同他握手并报以微笑。典礼完毕，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的招待会上，参军长商震对他特别亲热，还主动约他于当日下午五时单独会见。会晤时，商震郑重地向他说：“你们接防晚不了，我们的部队必须开往东北，无法在越南久留，魏德迈将军已通知我们，即将给正待开拔到东北去的六十

军、五十三军施种牛痘，进行防疫措施。”作为蒋介石左右的亲密大员、参军长商震竟任意透露军机，真使萨朗不禁又惊又喜！

萨朗继而由大使馆武官吉业马陪同与军令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会晤，萨朗迫不及待地提出几个越北急需解决的问题。对败退滇边的法军要求返越问题，郑介民只允他们走老挝的路线，先去老挝。对困居在河内军营的六千名法军迫切要求恢复武装问题，郑介民只答应考虑，而不作肯定的答复。这使萨朗感到特别焦急。郑介民仅见萨朗一次，以后据说郑介民出差，由副厅长龚愚接见，但每次接谈总是不得要领，未满足法方要求的唯一理由就是在中国军队撤走前，避免法越之间的武装冲突，维护华侨利益不受损害。

另一方面，萨朗在重庆外交使团中的活动，收获却很丰硕。特别是1946年1月8日，荷兰大使罗芬克同他的长时间谈话，使他颇受启发。荷兰大使说，他刚从南京来，他看到那里的日本人趾高气扬，丝毫没有战败国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坐着漂亮的汽车，驰骋来往，旁若无人，根本不象低声下气、哀求投降的模样。中国人要为他们的长官腾出日本人所占领的海军大楼，日本人竟悍然留难。在上海，大学生到处游行示威，高喊“美国佬，滚出去！”这简直是在发疯，只要一些小摩擦，就可以掀起反欧的浪潮。法国的三色旗曾被他们拉下……中国沉浸在排外风潮的旋涡之中，近来又有反美的运动。经过八年抗日战争，而中国对联合国胜利所带给他们的果实，竟无法利用。

这位大使还对萨朗说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。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高尚的，他们的风纪、传统都是很中国式的。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，生于湖南长沙附近，年轻时就是坚强的共产党人。周恩来是知识分子革命家，黄埔军

校政治部主任。朱德是云南军校出身、留学过德国的军人。这三位中共领袖都把“长征”这副艰巨的重担，挑在自己结实的肩上。他们是中国真正代表。共产党的军官大多数是学生、职员、军干，对国民党的腐败莫不表示痛心疾首。北方分到大地主土地的大批农民大大地壮大了共产党的队伍。

这位大使还说，共产党能使用的军队实数约一百二十万人。战争的结束使他们获得很大的益处。在正踏上消亡道路的中国国民党政府面前，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人就成为一种伟大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主持的国共和谈实际上毫无结果的原因——事实上毛泽东、周恩来仅在几个点上作了些让步，但实际仍坚守他们的阵地。正是由于他们的真抗战，才导致日本的失败。

这位大使最后说：“战争一结束，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面前的，是数不清的困难。造反浪潮此起彼伏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实在看不出来！”

萨朗对荷兰大使这一全面、清楚和精辟的阐述表示十分感谢。他从荷兰大使的阐述中获得很大启示。他在回忆录中洋洋得意地写道：“我从中取得了我在行将继续谈判时所需要利用的东西。”<sup>②</sup>

萨朗还见到了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。<sup>③</sup>罗申对他说：“蒋介石的命运不会太长了！他们不懂得处理欧洲人的事务，他们念念不忘的无非是怎样恢复祖先的边界，这就是目前排外浪潮的由来。”

最不能使萨朗忘怀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私人代表卡尔登·德·维亚尔将军对他的支援。早在1月8日，在吉业马的宴会上，他就认识了英国武官卡普曼·瓦克上校。通过他，1月11日上午10时30分，萨朗往访这位英国首相代表——

残废将军卡尔登·德·维亚尔。他对萨朗说：“如遇到困难，这是可预料到的，望你从速通知我，以便向蒋委员长讲。”1月18日维亚尔又邀萨朗谈话，他说，1月21日他要往新加坡去会见蒙巴顿元帅。1月17日，他见到了蒋介石。他问蒋介石：“你的军队将于何时从越南撤退？”蒋介石答：“将在四、五个星期以后。”他又问蒋：“你对印度支那有什么想法？”蒋答：“没有。”维亚尔说：“我认为蒋本人是善意的，但下级人员未必能照着命令去执行。”

### 不虚此行 满意而归

1月21日，军令部大摆宴席，款待萨朗。在大小各级参谋将校中就有参军长商震、军令部次长秦德纯。秦德纯对被囚居在河内的法军迫切要求恢复武装问题很表同情。在觥筹交错之际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萨朗说：“交防以后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越南共产党人。我们知道这些人将要制造种种困难。我们北方的事情也远不能解决，仅山东一省，四分之三已变成红色了。”萨朗说他始终只有一个相同的回答：“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面对着共同的敌人，你们就应该允许我们在河内拥有必要的手段来进行战斗，你们能准许我们武装吗？法国正象中国一样，希望越北能维持秩序。你们既要撤退，就应该配合这些形势来安排撤退啊！”

请看，萨朗这位法国殖民者与中国反动军人是多么情投意合！

最后，萨朗终于收到了二厅代厅长龚愚给他的书面照会，主要有两点答复：一、在滇边受庇护的法军三千六百人可即

时返回老挝；二、河内军营手无寸铁的法军六千人在原则上准予恢复武装，但须等候交防协议的签订。

萨朗这次到重庆，收获不小，可算是不虚此行。他于2月2日离重庆到昆明。在昆明接到霍揆彰将军转达蒋介石的电报通知：“准许暂驻滇边的法军即日启程返老挝，并命令中国沿途军警给予友好的照顾。”

值得顺便一提的是，1月19日萨朗与大使梅理儒和参赞戴立堂的一段谈话。萨朗说：“目前必须抓紧时间，在我们的书面照会或口头谈话中，务必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词，切忌向中国人暴露我们要重返越北的坚强决心。”大使表示同意。他继续说：“他们缺点太大了，以致他们无法解决从过去日本战靴下收复各省的艰巨工作……我们要竭尽全力之所及，利用他们的弱点，返回越北，重建旧业。冲突是会有有的，宣战则不可能！”④

这就是萨朗“重庆之行”的总结！

① 见《萨朗回忆录》。

② 同上，第一卷第258—282页。

③ 罗申是新中国诞生后，首任苏联驻华大使。

④ 见《萨朗回忆录》第一卷第275页。